



朱熹“四本说”的道德内涵及现实意义

<http://www.firstlight.cn> 2007-12-12

朱熹“四本说”的道德内涵及现实意义

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曾在他的诞生地尤溪县城关题写过四句至理名言。当年朱熹寓居之所郑氏馆舍的后人，将这四句话刻制成四块板联悬挂于室，代代相传。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郑氏后人郑大育先生将这四块朱熹手迹板联赠送给尤溪县博物馆珍藏。朱熹的这四句至理名言便是：“读书起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不妨就把它称为“四本说”吧。朱熹的“四本说”不愧是立家的根本，也是做人的根本，有着丰富的道德内涵。在当前举国上下学习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之际，朱熹的“四本说”仍不失其可借鉴可汲取的作用，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古人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成是一种人生追求。欲“治国、平天下”，首先要学会“修身齐家”。如何才能“修身齐家”，朱熹的“四本说”提出了四项基本要求：读书、循理、和顺、勤俭。

“读书起家之本。”朱熹把“读书”看作“起家”的第一要务，兴家、发家的根本。古人“读书”，读的是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四书五经”，并把饱读诗书看作出仕入第、为国效劳的根本途径。这自有他的道理。“人非生而知之”，不学无以明是非，无以知天下，无以成圣贤。所以，发愤苦读，埋身功名，读书做官，报国治民，光宗耀祖，成了古代许多读书人的终生追求，也是世代相袭的一条祖训。在朱熹看来，“读书”即是“穷理”。而他自己则为“穷理”而奋斗终生。在他的近百篇封事、奏札里，无不可见其运用“存天理，灭人欲”的原则，评议朝政得失，力求“分邪正，别是非”的执著。他认为“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须还他是，非者须还他非，方是自然之本。若不分邪正，不别是非，而但欲其平，决无可本之理。”（《与田侍郎子真》）他主张从四书五经中找对策，他认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而要把这门“正当学问”学到手，则必须“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故君子之学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玉山讲义》）今天讲“读书”，可读的书要比“四书五经”广泛得多了，必须持之以恒地“活到老，学到老”，否则，昨天的饱学之士，仍难脱当今“文盲”的尴尬；今天的“博士”，也可能成为明天的“科盲”、“法盲”。

“循理保家之本。”朱熹认为“循理”是家道长盛不衰得以保全延续的根本。在朱熹看来，“循理”即是顺从天理。朱熹认为“善者便是天理，恶者便是人欲”。（《答傅诚子》）这里的“天理人欲”是朱熹适应时代需要有针对性提出的是非标准。它与孔子的“克己复礼”一脉相承。“礼”即天理，“己”即私欲。天理指封建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即三纲五常。在封建社会，“三纲五常”意味着国家的安宁与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秩序。朱熹认为“天下国家之所以长久安宁，唯赖朝廷三纲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于上，然后守藩述职之臣有以禀承宣布于下，所以内外相维，小大顺序，虽有强猾奸宄之人，无所逞其志而为乱。不然，则以一介白面书生强而置诸数千百里军民之上，彼亦何所凭恃而能服其众哉（《乞放归田里状》）！”“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乐记动静说》）。”要“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因此，“存天理，灭人欲”事关重大，决定国家前途与个人得失。“存天理”，即所以为国家社会保存公正之风；“灭人欲”，即所以为人民群众清除私邪之气。必须指出的是，朱熹主张“灭人欲”的“人欲”并不是泛指人的一切欲望，而是专指过分追求利欲、违背道德原则的欲望。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去除一切感性欲望，而是以道德意识克服违背道德原则过分追求利欲的意识，把个人的欲望尽可能减低以服从社会的道德要求。天理明则德业可立，人欲去始可尽其官守。“君子贵明理也，理明则异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乱，而德可久，业可大矣。”（《答汪尚书书》）人欲不去，则无法尽其官守，无法正版权，均田税。朱熹认为，一国之君，应遵守三纲五常。因此，他力谏南宋皇帝“各自爱惜其土地人民，谨守其祖先之业，以为遗其子孙之计”，选贤任能，立振兴旧邦之志，以战守为天理，以求和投降为人欲。这就是朱熹以“存天理，灭人欲”来明是非，别善恶，张正气，挾奸臣的“循理”说。循理以保家，据理以治国，其道理是一样的。当然，我们今天讲“循理”，循的应是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以及一切科学的真理，而不能不问良莠地循封建主义的道德伦理。

“和顺齐家之本。”朱熹认为“和顺”是整治家业的基础。“和顺”，即和协顺从、和睦相处的意思。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维持家庭关系的和睦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有极重要的意义。所以，古人极重“齐家”，视“和顺”为齐家之本。合家和睦的关键在于父义、母慈、兄恭、子孝。“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这就是古代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伦理规范。朱子家训承接了古人的训导，

曰：“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蛟川朱氏宗谱》）朱熹认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柔，是“和顺”的基本含义。他把“三纲五常”纳入“天理”的范畴。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说的都是家庭伦理。君为臣纲，实际上是父为子纲的扩大。一国之君被尊为君父，职守一方的官员为君父之臣，也是民之“父母官”。父慈，在于教子以义方。子女对家长要绝对服从，即使父母有过，当子女的也只能“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也”。“亲亲、仁民、爱物，三者是为仁之事。亲亲是第一件事，故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经刊误》）“人能孝弟（同“悌”），则其心和顺，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乱也。”（《论语集注·学而》）由仁而孝弟，便能收不好犯上作乱之效；按此力行，便能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熹还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视为“人之大伦”。（《仪礼经传通解》）“人之大伦，夫妇居一，三纲之首，理不可废。”（《杂学辨·张无垢中庸解》）规定妇女“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礼记·本命》），并要求妇女贞节，夫丧不改嫁。从总体来看，朱熹将“和顺”视为齐家之本，有他的积极意义，尤其是把“和（协）”看作首位。但他在家庭关系中强调“顺（从）”，绝对的服从，则是以牺牲为子、为妻、为弟的个性及人性为代价的，有其消极不可取的一面。

“勤俭治家之本。”朱熹把“勤俭”看作管理家业的根本，至今仍有很强的积极意义。所谓勤俭，即勤劳与节俭。勤劳，要求人们热爱劳动，积极参加劳动，勤奋努力，不怕苦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和丰富自己的生活。节俭，则要求人们节制自己的生活欲望，约束自己的消费行为，俭约生活，节约财用。勤俭是君子之德。作为道德规范，勤俭必敬业节用，应不奢不吝。对于家庭来说，是“治家之本”；对于国家来说，则是“富国之道”。“治家者，勤苦操作矣，又必节食省衣，量入为出，夫而后仓有余粮之积，门无索逋之呼。”（严复语）“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婪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司马光《训俭示康》）古代传统道德往往将勤俭的美德延及爱物、惜物的道德规范。“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绩之辛苦。”（《贞观政要》）在小农经济时代，古人崇尚勤劳致富、节俭立业的美德，而将巧取豪夺、贪贿劫盗视为不齿。今天，我们在创造小康生活、走向现代化明天的过程中，仍然应该推崇勤俭的美德。居官不贪污受贿、经商不弄虚作假、生产不作伪制假、为民不强取偷盗，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去创造美好的生活，不攀富比阔，不挥霍浪费，当用则用，当省则省。这就是勤俭治家传统美德的现实意义。当然，随着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应该生活得越来越好，这和节俭并不矛盾。“富而思进”，社会才会发展，人类才会前进。

综上所述，朱熹“四本说”的合理内核至今仍值得借鉴。“读书、循理、和顺、勤俭”八字规范，仍可赋以新意而发扬光大。在今天，知识日益更新，科技飞速发展，发家致富，强国富民，不读书则一事无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依法治国，依法办事，遵循世贸组织规则驰骋国际市场；需要以德治国，以德修身，恪守公民道德规范营造诚信社会，不读书则难以行止。提倡循理，就是提倡守法守纪，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规则和道德行为准则，尊重并研究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利用它为社会造福。公民该尽的义务不能不尽，该有的权利应依法维护。这就是“循理”在今天的基本要求。至于“和顺”，我们倡导团结友善、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邻里团结，建立起“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新型人际关系；反对不讲原则的顺从和服从，摒弃“和顺”中封建伦理的糟粕。这样，“和顺”仍可作为齐家处世的一条有益的道德准则。“勤俭”，更是贯通古今，永续秉承的美德。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爱护公物，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珍惜人力物力。今天讲“勤俭”，含义更广泛，内容更充实，既继承了传统，又融进了时代要求。只要我们能够保持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我们就能在本世纪中叶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国家。

陈道南

[存档文本](#)